

研究論文

「述行性連結」與數字女性主義行動： 基於中國MeToo運動的探討

黃月琴、黃瑤

摘要

2018年中國MeToo運動的興起是全球MeToo運動波及中國內地並激發新一輪性別抗爭的結果，其背景是數字傳播技術的興起以及集體行動的轉型。本文立足於中國MeToo運動的經驗實踐，在「性別述行性」理論基礎上著重挖掘女性MeToo敘事中所包含的情感、意義和關係連結性，以修正「連結性行動」忽視人的互動性與能動性的偏誤，並發展出「述行性連結」這一概念。「述行性連結」具有兩個層面的連結性維度：其一是語言主體間的能動性連結，其二是數字傳播的技術性連結。前者是數字女性主義行動的內在動因，而新傳播技術被視為組織和擴展女性主義述行實踐的文化技術。二者之間相互交織與迭加，形成「締合性」的「數字述行性連結」構型。

關鍵詞：數字述行性連結、MeToo運動、女性主義、反性騷擾、問題化

黃月琴，華中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新聞系教授。研究興趣：媒介社會學、政治傳播、媒介文化。電郵：hbuhyq@126.com

黃瑤，湖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新聞系碩士。研究興趣：媒介社會學。電郵：335963135@qq.com

論文投稿日期：2020年2月28日。論文接受日期：2020年11月18日。

Research Article

Performative Connectivity and Digital Feminist Action: A Study on the MeToo Movement in China

Yueqin HUANG, Yao HUANG

Abstract

The rise of the MeToo movement in China in 2018 was the result of the spread of the global MeToo movement to mainland China, which inspired a new round of gender struggle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rise of digital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 Based on the empirical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MeToo movement and gender performativity theory, this study focuses on exploring the connections among emotions, meaning, and relationships in women's MeToo narratives to correct the bias of "connective action" in neglecting human interaction and dynamism. The author develops a new concept of performative connectivity, which includes two dimensions: the dynamic connection of linguistic inter-subjectivity and the technical connection of digital communication. The dynamic connection is the intrinsic motivation for digital feminist action, while digital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s seen as the cultural technology used to organize and expand feminist discourse and practices. The two are overlapping and closely intertwined, thus forming the associated configuration of "digital performative connectivity."

Yueqin HU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media sociology,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media culture.

Yao HUANG (MA).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ubei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media sociology.

Performative Connectivity and Digital Feminist Action

Keywords: digital performative connectivity, MeToo movement, feminism, anti-sexual harassment, problematization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Huang, Y., & Huang, Y. (2021). Performative connectivity and digital feminist action: A study on the MeToo movement in China.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57, 191–224.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7期(2021)

反性騷擾是一場「古老的性別的戰爭」(艾曉明, 2018年7月29日), 它揭示了一種隱秘、廣泛而又具體而微的性暴力形式在日常生活中的結構性存在。2017年10月, 在好萊塢電影大亨哈威·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的性騷擾醜聞風波中, 女演員艾莉莎·米蘭諾(Alyssa Milano)在推特上號召所有被性騷擾或性侵過的女性都能發一條「#MeToo」狀態, 以喚起社會對此問題的重視, 由此拉開了全球MeToo運動的序幕。一個多月內, 該運動波及範圍達85個國家和地區(李永博, 2018; Sayej, 2017)。2018年1月1日, MeToo運動在中國開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畢業生羅茜茜以「#MeToo」為話語標籤, 實名舉報北航教師、教育部「長江學者」陳小武, 指控他曾經性騷擾包括自己在內的多名女生, 並將舉報內容公佈在微信公眾平台及新浪微博等社交媒體上。隨後, 更多性騷擾舉報事件在網絡空間湧現。4月份開始, 中國MeToo運動的目標領域開始從高校圈擴散到公益、體育、音樂、媒體和文化圈。著名公益名人、電視節目主持人、名記者、宗教界領袖等多人被接連舉報。這一舉報浪潮在7月達到高點, 有關性騷擾的網絡輿論也達到峰值。

中國MeToo運動的興起是全球MeToo運動波及中國內地並激發新一輪性別抗爭的結果, 同時也是中國女性主義運動在新的社會現實和新媒介技術條件的一次具體展開。從20世紀末期開始, 「反性騷擾」已成為一種話語, 強勢介入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潘綏銘、黃盈盈, 2007), 但性騷擾現象實際很少受到社會正視或進入社會問題清單(王思斌, 1999: 217; 白露, 2011: 9; 劉小楠, 2014: 41-48)。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興起的由政府組織主導的女權行動近年持續陷入低潮, 不僅難以獲得活動許可, 而且在新舊媒體上的活動痕跡也被刪除殆盡, 女權行動的社會記憶和資訊參照都出現歷史性斷層(李思磐, 2020)。此種情形下, MeToo運動在中國的興起被視為新一波女權抗爭浪潮的到來, 有研究者稱之為中國「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Wang, 2018; Zeng, 2020)。

隨著資訊通訊技術和移動傳播的深層次滲透, 數字媒體在今天已經不僅作為工具和管道, 更成為具有存在論意義的「元素性媒介」(elemental media) (Peters, 2015, pp. 1-5)。而連結(connectivity)這一源

「述行性連結」與數字女性主義行動

於技術領域的概念正成為數位文化的核心邏輯，人類的話語和行為正被數字化的連結邏輯所改寫和重構，數字網絡自治文化與個人化政治隨之崛起（卡斯特，2018：序），並催生了「連結性行動」這樣的社會運動新形態（班尼特、塞格伯格，2013）。中國MeToo運動的興起具有與世界同步的技術邏輯和動力基礎，但也攜帶著中國媒介化潮流下文化生產的特點和行動模式「基因」，須從歷史與時代的「給定」（the given）出發，問題化（problematize）自身處境並「向政治發問」（福柯、拉比諾，2020）。本文立足於中國MeToo運動的情境和案例，將女性行動者的MeToo敘事和「網絡舉報」視作「以言施事」的「述行」（performative）實踐，並勾連西方社運理論和「連結性行動」概念，探討行動者的話語實踐如何與數字網絡技術實踐相結合構成數字社會運動的「連結性」文化策略。

文獻探討與研究問題

性騷擾（sexual harassment）在西方是一個有著特定規定性的概念，國際組織和各國相關法律對其定義明確地指向存在權力關係或者上下級關係的場域，一般被界定在「工作場所」中。作為舶來品，「性騷擾」概念在中文語境中出現了含義泛化趨向，「只要是一方通過語言、文字、圖像或者肢體行為等有關性內容的侵犯或暗示，給另一方造成心理上的反感、壓抑和恐慌，都可構成性騷擾」（沈奕菲，2004），在法理上則歸入對公民一般人格尊嚴權的侵犯。這種泛化的理解和判斷影響了反性騷擾在中國的行動路徑和政策方向（酈菁，2018a，2018b）。反性騷擾議題若要獲取社會關注或架構為社會問題，常須取徑情感、道德論述和社會輿論，並以此作為解決問題的砝碼。由於缺乏線下行動的合法性資源、組織資源與制度性資源，中國MeToo運動的展開高度依賴個體敘事和社交媒體的連結，其具體形式、規模、結果和走向亦深受互聯網內容審查的限制性影響，處於一種動態的博弈之中（楊國斌，2017；Fu，2017；King，Pan，& Roberts，2013；Li & Li，2017；Tan，2017；Yang，2014）。部分學者以網絡審查為視角，描述了中國MeToo運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7期(2021)

動的行動者如何運用靈活的數字策略開展抗爭並繞過線上審查(Zeng, 2019, 2020)。

自MeToo運動在全球湧現以來，國際學術界已產出較為豐富的研究成果。在研究視角上，西方學者對MeToo運動的大量研究側重於討論具體的職場、工作領域或者特定勞動場所內的性騷擾或性侵問題，比如在學術、醫療衛生、健康、交通、服務業、體育等特定領域內評估性騷擾問題的現狀、困境或提出具體的解決方案。非西方的研究者則傾向於從階級、階層、種族、種姓等宏觀視角研究本國/地區內性騷擾問題產生的個體與社會根源、社會心理以及制度困境。但研究者普遍認識到，Twitter、Facebook、微博等社交媒體對MeToo運動的形成和展開意義非凡，它所提供的可見性和所孕育的社區在很大程度上發揮了積極正面的作用(Suk et al., 2019; Zeng, 2019, 2020)。然而數字傳播技術對女性主義運動的作用機制究竟如何，其深層邏輯是什麼，則是需要進一步揭示的核心問題。美國政治學者班尼特和塞格伯格於2012年首次提出的「連結性行動」(connective action)概念對此提供了重要啟發，許多數字社運包括數字女性主義行動的研究基本依循了這一概念工具所提供的思維路徑(Berridge & Portwood-Stacer, 2015; Dixon, 2014; Horeck, 2014; Mendes, Ringrose, & Keller, 2018)。

「連結性行動」理論(班尼特、塞格伯格, 2013)指出大規模的、持續性的抗議運動對數字媒體的使用已經不限於發送和接受訊息，傳播已取代實體組織成為社會運動組織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組織動因。「連結性行動」的邏輯與既有的高度組織化的、形成集體身份/認同的「集體性行動」(collective action)的邏輯形成對照，構成社會運動的新形態。這種新形態表現在：「連結性行動」的組織是由多層次的數字和人際傳播網絡所組成；運動不再需要以建立集體認同或者集體身份為組織和動員前提，而是更趨個人化、媒介化和數字化，並能更加靈活順應不斷變化的政治目標，彌合不同議題之間的分歧等。班尼特和塞格伯格(2013)還指出，連結性行動儘管有不同模式，但是依舊展現了蒂利(Tilly, 2006)所總結的政治運動的「WUNC模式」，即價值重大(worthiness)、團結與眾志成城(unity)、參與人數眾多(number)和忠於承諾(commitment)。不過，新型的「連結性行動」為何以及在何種意義

上依循經典的「WUNC」模式？怎樣理解「團結與眾志成城」與新運動形態「無需集體認同」這一特點之間的邏輯矛盾？這些問題沒有得到解釋，給後續研究留下進一步探討的空間。

「連結性行動」的提出對數字社會運動理論的進展具有重要意義，在學術界廣為矚目。Olsson (2016) 評價它廣泛融合了後現代個體化理論、個性化政治、數位媒體的網絡邏輯以及社會運動的多種思想資源，及時回應了現實發展。這一概念植根於現代性向晚期現代性狀態的轉變以及相伴隨的廣泛的社會與文化轉型，包括專家系統信任的流失，政治和公民身份模式的轉變等。班尼特認為晚期現代性的公民已從「盡責的公民身份」(Dutiful Citizenship) (簡稱DC公民) 轉向「實現的公民身份」(Actualizing Citizenship) (簡稱AC公民)。DC是現代性公民身份，主要以投票、加入政黨和建立民間社會組織等方式踐行。而AC是後現代身份，典型的AC公民是年輕人，他們的責任和義務感逐漸減弱 (Bennett, 2008, p. 14)，更傾向於參與個人化政治，而不是參與正式組織的政治實踐。AC公民的崛起改變了公民參與的含義和「政治」的界限，而這一改變離不開互聯網的助力 (Bennett, Wells, & Rank, 2009)。在數字網絡技術的推動下，AC公民越來越偏愛鬆散、非正式和網絡化的交流。

「連結性行動」概念陸續遭到批判性質疑，Postill (2013) 認為它在自組織理論、網絡理論和抗爭政治理論之間游移不清，在方法論上失之籠統。它在強調網絡技術機制的同時忽視了人的行動因素，忽視人如何協同部署作為「社會技術」(social technology) 的網絡媒介。數字社運中不同的行動網絡有不同的邏輯，這些邏輯不能簡單地用網絡傳播技術的單一機制來解釋。因此「連結性行動」的缺陷是以技術邏輯遮蔽了其他邏輯，陷入「網絡形式產生抗爭行為類型」的因果線性論證窠臼，趨近形態決定論。Karpf (2014) 和 Kavada (2015) 批評這一理論忽視了深度、密集參與的核心成員的重要性。其他批評者 (Bondes & Schucher, 2014; Lim, 2013) 則認為，「連結性行動」所指的往往是短暫而不可持續的現象，對線下事件的影響有限。

數字女性主義行動研究者對「連結性行動」理論進行了更細緻的修正或者挑戰。Trott (2017) 批評「連結性行動」所代表的數字行動主義研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7期(2021)

究傾向於關注結構而不是人際動力。她借鑒Freeman (1972)的「無結構暴政」概念，論證「連結性行動」理論所強調的「非正式結構」有導致女性主義運動走向精英主義和歧視永久化的危險，社運研究者和政治學者應重新思考當代數字抗爭活動中的「無結構」概念。為修正這一錯誤偏向，Trott (2017)發展了「友誼網絡」(friendship network)與「女性主義經理人」(feminist manager)兩個概念，論述數字技術裝備下的女性主義行動者在「連結性行動」中如何將人際動力關係前景化(foregrounding)，並提出「女性主義連結性行動」的研究視角。Papacharissi (2016)則提出「情感公眾」的概念，強調網絡平台傳播的故事結構、情感和事件對數字行動主義的中介性影響。Suk等(2019)研究MeToo運動中個人經驗的分享如何匯聚成大範圍的跨越機構與社群的行動召喚，指出網際空間中創傷經驗的分享創造了「網絡化的承認」(networked acknowledgement)，正是這種「網絡化的承認」支撐並維持了MeToo連結性行動的邏輯基礎。

在關於女性地位、階級/階層和社會參與的反思性理解上，MeToo運動研究展現了女性主義深遠的批判性傳統，主體、話語與權力關係成為重要的切入視角。研究者指出只要受害者和倖存者還繼續承受社會羞辱、指責和不信任，女性沉默就會是一個系統性的存在(Raphael, Rennison, & Jones, 2019)，因此建立打破沉默的機制依舊是數字女性主義運動的核心問題。MeToo運動能讓指控者或有權勢的被指控者被社會「可見」，但並不等於能夠讓問題「可見」(Zarkov & Davis, 2018)，在社交媒體時代，「打破沉默」與「打破圈層」需要同時突破。社交媒體曝光和「審判」還易引發性騷擾問題道德化，遮蔽制度化和正常司法審判的可能性。因此，女權運動的目標並不會因為新傳播技術的加持而自動達成，必須從歷史和社會脈絡上反思「誰在說」以及「誰能聽到」的問題(Zarkov & Davis, 2018)。這說明，MeToo運動涉及到廣泛而複雜的社會心理和結構性權力關係，其組織動因不在新傳播技術的單一因素之中，必須關注主體性、能動性與話語實踐等文化與權力因素的貫穿。

「連結性行動」理論有特別適用於解釋中國MeToo運動的一面。在媒體受到控制，社會動員與社會組織受到限制的情況下，傳統的集體行動模式對中國抗爭政治的解釋力有限，新傳播技術的解放性和社交媒體的連結作用的確關鍵。但是，只用「連結性行動」來概括這一運動是不夠的，還需要以綜合的視野和寬闊的社會互動脈絡來加以探究，

「述行性連結」與數字女性主義行動

更要避免數字技術「認知暴力」。在不同的政治社會情境，新傳播技術的組織功能所引發的政治效果並不相同。班尼特和塞格伯格(2013)宣稱「數位化人際網絡的連結在非民主社會催生了在廣場、營地、清真寺和大型集會中飽含強烈情感的、面對面的互動行為」，不過在中國，數字化人際網絡的連結技術催生的是虛擬的網絡行動，表現為基於論題的網絡話語的勃興，個體和群體敘事的湧現與符碼化的傳播接力，以及權力關係在虛擬空間與現實空間之間遷移、轉換、博弈而變幻不定。因此，「連結性行動」在相當程度上是網絡話語的集體行動。確切地說，中國MeToo運動是一場成規模的「述行」活動(排除了身體的物理聚集，「以言施事」)，語言以及通過語言所操演的故事、劇碼、空間等這些共用的連結性因素與傳播技術同等重要。在中國這樣的前現代、現代與後現代因素駁雜共生的「混合現代性」社會，在個人化政治崛起、AC公民湧現的背景下，DC公民的角色仍然沒有退場，她/他們作出的公共性努力不可忽略。這突顯出中國MeToo運動的「雜糅型」(hybridity)屬性(Chadwick, 2017)，更促使我們思考：如何重新理解「連結性」，如何將技術納入文化與權力的綜合視野來考慮數字女性主義運動，傳播技術實踐如何與主體的話語、意義實踐相互交織，形構更加複雜的連結性邏輯？

基於上述探討，本文進一步提出以下研究問題：

問題一：在中國MeToo運動中，行動者個體的MeToo敘事包含何種連結性因素？

問題二：個體與群體的「述行」如何運作，是否包含集體意識、團結與認同？

問題三：行動者的「述行」實踐如何與新傳播技術相結合，構成數字女性主義行動的「連結性」文化策略？

研究路徑與方法

本研究以2018年中國MeToo運動期間50個引發輿論反響的反性騷擾舉報案例為經驗對象，以「連結性行動」為理論參照，對MeToo行動者的「述行性」話語實踐進行分析。性別「述行性」(performativity)¹是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7期(2021)

女性主義思想家裘蒂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提出的概念，主要源於語言哲學家J·L·奧斯丁的「以言施事」理論(「言語本身就是行動」)，又進一步借鑒德里達的語言徵引理論和阿爾都塞的主體「召喚」觀念等理論資源而構成。巴特勒認為，社會性別的生產是一個語言生產的過程，女性身體和身份建構是社會規範依賴社會強制進行重複自我書寫、引用和互文的結果，通過語言與象徵的重複運作而生產和自我強化。女性抗爭的機會和資源在這一述行過程存在著重複書寫失敗或者徵引失敗的可能，引起語言符號的「脫域化」或「再語境化」。當語言有了「重新意指」的機會，關於「女性」的符碼和意義發生重組，新的女性主體和抗爭資源就得以產生(巴特勒，2011；何成洲，2014)。性別述行性理論要求行動者在言語實踐過程中一面對語言徵引鏈和象徵的強制性規範保持省察，一面發現其中的意義「裂縫」和抗爭資源，尋找重構社會邊界的可能。因此，「述行性」概念兼具行動的倫理和政治維度，需要同時在社會域和象徵域之中展開。只有通過「述行」，通過持續言語並「說出自己」，女性才有機會改變「被審視、被表達」的客體的命運。這意味著女性首先必須打破沉默，作為自身的言說者和積極施為者，超越「本質論」陷阱和性別身份的束縛，與具體情境展開互動(宋建麗，2018：2-12)。

本文將女性MeToo敘事和故事的回溯性講述視為女性主義述行實踐，以文本為重要的分析路徑。文本不是靜態的實體，而是「具有意義生產功能的超語言學裝置」，是作為一個動態的互文空間和權力交互界面來看待，始終關注關係過程、主體與社會參與機制在其中的運作(克里斯蒂娃，2016：13-15、36)。MeToo運動的文本又被新傳播技術所中介和塑造，提供了性別述行實踐研究的新場域。

MeToo運動的述行實踐以網絡實名舉報為開端。在中國的結構性情境中，網絡舉報是一種獨特的權力實踐方式，也是一種調動體制注意力的問題化技術和鬥爭策略。不過，國內關於「舉報」的政策規定舉報者必須實名，否則不予受理，因此匿名舉報雖然可造輿論，但不一定能引發現實「改變」，也就是說，難以進入體制的「問題化」清單。這一關鍵正如學者熊易寒(2007)所指出的，在中國，解決問題並不難，難的是「問題化」：即什麼問題可以引發政府關注並且進入其問題清

「述行性連結」與數字女性主義行動

單。在這種情境下，「網絡實名舉報」越來越突出，逐漸成為當下中國抗爭政治的「強劇碼」(strong repertoire) (蒂利，2012：47)。它採取訴諸輿論——「網絡曝光」和訴諸公權力——「實名舉報」的雙重行動策略，在體制內外、線上與線下的多重空間聯動運作，效果顯著。本文出於以上考慮，認為實名舉報案例更有典型性，並結合網絡公眾對於實名舉報案的關注度更高、討論更為充分的傳播現實，選取中國MeToo運動中50個實名舉報案例為研究對象，來考察其連結性意涵。

本文的研究路徑包括：第一，採集了50封網絡「舉報信」文本(約97,000字)進行質性分析，採用基於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導向的三級編碼，全面探究這些語料，最終產生關於MeToo運動的中心概念及其關係類屬。第二，採用網絡非參與式觀察方法跟進主要案例，定期瀏覽相關網站、微博和微信公眾號，收集相關公眾討論，²把握MeToo話語形態的演變和數字文本運動的進程和特徵。

本文所指的「舉報信」並不一定像常規信件那樣有完整的內容和格式，它是一種多樣態的數字化文本，其形式可能是一條微博、朋友圈通告或者一份網站投稿。本文搜集的50篇「舉報信」均由舉報者實名發佈於公開的網絡平台，其中22篇來自新浪微博、12篇來自微信公眾號、6篇來自微信朋友圈、4篇來自豆瓣、3篇來自知乎等。為應對網絡「刪帖」等不利條件，本文通過瀏覽Matters lab、NGO MeToo、#Me too這三個持續記錄中國MeToo運動發展進程的網站，並參考《中國米兔志》(搜集並備份了2018年1月至2019年7月間中國MeToo運動的相關文獻資料)來補充獲取必要的分析資料。除了高知名度並公開報導過的案例以外，本文涉及的案例及當事人均匿名處理，以字母縮寫或化名的方式稱呼。

述行：MeToo敘事及其連結性範疇

MeToo運動是關於受害者如何打破沉默、講述自己的故事的行動。女性主義者指出，女性解放的第一步是建立作為主體對於自身的宣示能力(宋建麗，2018：2)，也即述行——敘述自身故事的能力。本文對收集到的50份舉報信文本進行質性的紮根理論導向分析，通過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7期(2021)

開放式編碼、主軸編碼和選擇性編碼三個步驟，探究這些MeToo故事中的敘事範疇與連結關係意涵。相關分析過程如下：

開放式編碼：MeToo 述行的基本範疇

在開放編碼階段，本文對全部樣本進行逐詞逐句分解、編碼，將所得代碼不斷進行比較與歸併，最終得到62個初始代碼，通過分析代碼之間的區別與聯繫，將其歸納整合成為10個基本範疇，即身份性資訊、背景性資訊、過程性資訊、證據性資訊、雙方形象、事件後果(分為創傷情感、心理障礙和人生困境)、舉報訴求、舉報困境、經驗分享和理性批判。囿於篇幅限制，下表中只保留少量具有代表性的原始資料編碼樣本，用於展現編碼過程和思路。如表一：

表一 開放編碼：基本範疇

原始資料	初始代碼	基本範疇
這次我跟隨當年的老師同學們實名出來說話，就是要揭露瀋陽，別再演下去了。//撕裂某些冠冕堂皇的人類學教授的面具	揭露真相	舉報訴求
我不希望將來我的孩子、你的孩子會再遇到這樣的事。	著眼未來	
一定能像北航對「陳小武教授」停職查辦一樣，嚴肅公正的處理此事。	處理當事人	
我們希望把黑暗曝曬到陽光下，以期正義。	追求正義	
決定寫出來是為了聲援已經站出來的姑娘們朋友們	聲援同伴	
一而再再而三地做這些醜惡的事，我沒有辦法再原諒你，你必須自首懺悔。//懇切希望能認識到自己的問題，能對自己曾經的錯誤做出道歉	要求自首懺悔、道歉	
不要迷信於所謂「大佬」、「權威」的個人操守，而是理性對待，有錯該指出就應該指出，同時建立良好的防範機制以避免更多類似事件發生	建立機制	
願反性侵能夠早日立法	立法	

主軸編碼：MeToo 述行中的關係類別

在主軸編碼階段，通過進一步挖掘基本範疇之間的聯繫，通過整合，發現各相關範疇之間內在的邏輯聯繫。本文對上述10個基本範疇進行聚類分析後，最終形成四種範疇關係。如表二：

「述行性連結」與數字女性主義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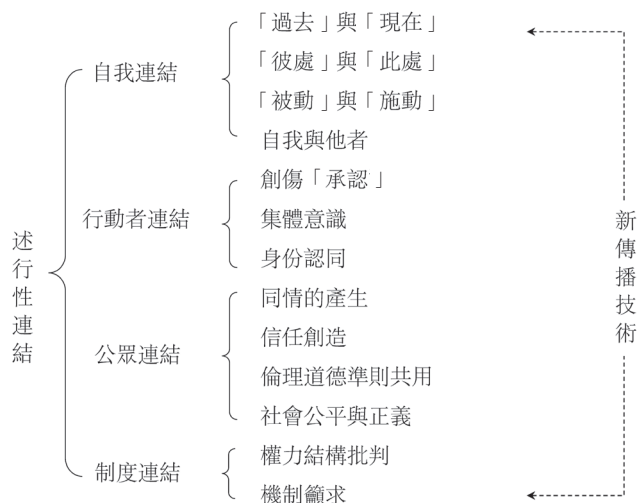
表二 主軸編碼：範疇關係

關係類別	關係內涵	影響關係的基本範疇
舉報者和被舉報者	舉報者描述雙方社會身份；通過時間、地點等細節性資訊回憶被性騷擾的過程；通過對肢體、語言細節的回溯為被舉報者畫像。描述事件的創傷性後果	身份性資訊、背景性資訊、過程性資訊、雙方形象、事件後果(創傷情感、心理障礙、人生困境)
舉報者和舉報者	舉報者基於類似的經歷，彼此互為語境，互相激勵發聲	背景性資訊、舉報困境、創傷情感、經驗分享
舉報者和舉報信受眾(公眾)	為獲取最大程度的信任，舉報者以公開個人資訊為代價，同時公佈聊天記錄截圖等來證明真實性；同情與共情	身份性資訊、證據性資訊、事件後果(創傷情感、心理障礙、人生困境)
舉報者與制度	反性騷擾和舉報經歷使舉報者對制度、法律、個人生活和社會交往方式產生反思性批判和經驗總結	舉報訴求、舉報困境、理性批判

選擇性編碼：「述行性連結」概念及其類屬

選擇性編碼是結合對10個基本範疇及其四類關係的理解，提煉抽象出核心範疇，最終構建一個整體的概念模型。如圖一：

圖一 「述行性連結」概念關係圖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7期(2021)

「述行性連結」的運作與話語機制

為了進一步闡述「述行性連結」的概念構型，下文將從四個層面具體解析MeToo述行所包含的「連結性」意涵以及所關聯的話語實踐，並揭示其展開的敘事機制。

自我連結：語言徵引鏈與自我的技術

「自我技術」是個體通過自己的力量或他人的幫助，對自身身體及思想、行為、存在方式的一系列操控，達到自我的轉變和謀求某種狀態(福柯，2016：53-54)。在巴特勒看來，女性的自我技術是通過言語行為的「述行」實踐得以生成的，自我技術就蘊含於語言和象徵鏈條的徵引運作之中。

MeToo運動的網絡舉報信包含著大量的對自我的回溯性論述。編碼分析顯示，受害者對自我的回憶往往充滿著強烈的羞恥、震驚、自責和污穢感等創傷情感和壓抑的自我意識。DF事件的舉報信〈「未遂」之後呢？成功say NO又如何？〉記載了女性被性侵(未遂)以後，反覆對自己發問「為什麼是我？為什麼是他？為什麼他會對我這樣？什麼都沒發生，為什麼我卻覺得自己已經『髒』了？」這是一種典型的自我反應，根植於女性的自我凝視。男性統治是一套根深蒂固的權力關係，建立在性別勞動分工、共同體成員資格認定以及象徵資源配置的基礎之上，不僅滲透於空間和時間的結構之中，還體現於女性和男性的意識、認知與語言結構之中，使被統治者不知不覺地參與了對自身的統治(布爾迪厄，2017：8；愛爾斯坦，2019)。女性通過複製和內化男性「目光」，將性騷擾問題引向針對自我的判斷。因此性騷擾侵害往往導致女性產生深度的精神創傷——自我攻擊與自我貶損，甚至摧毀介入世界的整體視角(武秀琴，2013)。在舉報者的MeToo敘事中，這一後果在「情感創傷」、「心理障礙」和「人生困境」這三個編碼節點中有集中體現。受害者頻頻徵引師生道德規範和長幼倫理框架，如以「師道」、「英雄」、「模範」、「長者父輩」等詞彙表達期望，以「為師不尊」、「為老不尊」、「道貌岸然」、「厚顏無恥」等詞彙表達憤怒，繼而將舉報行為賦

「述行性連結」與數字女性主義行動

予道德正當性和社會意義。但依據巴特勒的性別述行性原理，這可能是語言結構和精神結構上的自我迴圈和強化複製，原因在於其徵引的道德框架和「超級敘事」本身滲透著男權中心秩序。女性主義者必須意識到，關於女性的行動論述僅在既有的道德秩序框架內展開是沒有出路的，它難以生成真正的政治抗爭和實現普遍權利意義上的平等解放。

巴特勒指出打破這一語言和精神迴環的希望，仍然在於述行實踐，即更多的反身性講述，以尋找語言的「脫語境化」和「重新意指」，開啟自我的創造性轉化和主體生產（巴特勒，2011）。在MeToo敘事文本中，這種主體生產的痕跡往往存在於新的資源引入或新的正當性話語生成之時，比如公民權利話語或現代性話語的引入和轉換。因此舉報者關於「自我」的敘事常包含對照性的話語結構，如：「過去—現在」、「彼處—此處」、「被動（的我）—施動（的我）」等，其話語轉折處不僅意味著個體位置和象徵資源的轉換，也表徵著意識重組和身份再造過程在主體內部的展開。正是通過這種「索引性表達」和話語重組，MeToo故事成為一種自我的技術。

行動者連結：情感連帶、集體意識與責任感

經歷性創傷最糟糕的一件事就是感覺自己（孤獨）一個人……相反，當人們說，「這件事也發生在我身上，我理解你」，一種聯繫就發生了……「metoo」是一種簡潔而有力的與其他人建立聯繫的方式，並讓人們開始他們的治癒之旅。（Burke, 2017）

創傷是一種個體性的精神體驗，創傷敘事不僅承擔著回溯記憶、重塑自我的功能，也具有分享經驗的功能（徐小棠，2018）。中國MeToo運動集中發生在高校、公益機構、傳媒與文化領域內，具有一定的圈層性，受害女性在經驗處境、情感結構、舉報困境等方面有相當程度上的相似性，這構成分享的基礎。為了解舉報者的情感結構，本研究對50封舉報信中的情緒性詞語進行詞頻統計分析後發現，其共用的情感有「噁心」（26%）、「害怕」（23%）、「痛苦」（18%）、「擔心」（15%）、「抑鬱」（9%）和「噩夢」（9%）這六種主要類型。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7期（2021）

傳播可以驅散孤獨，來「治療人的病症」（彼得斯，2003：18），創傷能被看見、理解和共情是一種「治癒」。而「來自倖存者的智慧，以及在虛擬社群和現實生活中培養愛與責任感的對話」是建立治癒機制的主要來源（Raphael, Rennison, & Jones, 2019）。正如一位舉報者所述：

它（MeToo運動）第一次資訊密集地告訴我們，原來我不是一個人，原來這不是我的問題，原來我可以接納自己。就像林奕含在《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後記中寫的那樣：「你知道嗎？你的文章裡有一種密碼。只有處在這樣的處境的女孩才能解讀出那密碼。就算只有一個人，千百個人中有一個人看到，她也不再是孤單的了」。（中國米兔志編輯組，2019年8月25日）

ZJ事件的舉報人弦子在接受採訪時說：

我現在意識到MeToo運動是如何發展和擴大的：它不依賴於男性，而是依賴於迅速建立團結的女性。如果你是一個女人，如果你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每個人的身體都會有某種（性虐待）記憶，你永遠無法擺脫這種記憶。其他女人對我有同情，是因為我們的身體有共同的記憶。我母親能理解我的故事，不是因為她是她的女兒，而是因為她也是一個女人，她也有過類似的經歷……（楊宙，2018年8月22日）

這種記憶和精神上的連結是MeToo行動的構成性密碼，它既是「連結性行動」之所以產生的前提，也是其內在推動因素。

巴特勒（2014）指出，性別身份的操演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群體中共同完成的：「多數時候，我們把身體的自主權這樣的『權利』理解為個人的，或與個體相關的，但是當我們反對歧視時，我們是作為一個團體或一個階級來據理力爭的……行動者走向聯合是女性主義運動的必然選擇」。通過群體述行，「那種先前被化作碎片和私下處理的蔑視經驗在這一視界中就可能成為『為承認而鬥爭』的集體道德動機」（霍耐特，2005：4）。ZW事件的舉報者寫道，「我是受了MeToo的鼓舞而站出來，我的經歷也成為MeToo風潮的一部分，和更多受過侵害的女性

一起戰鬥，是我的驕傲。」在這類表述中，MeToo行動不再僅是一種「個體化政治」，而是滲透著集體意識和群體性情感的認同政治，並且蘊含著社會責任意識的發生。在「舉報訴求」話語中，不少舉報者認為自己對其他受害者或整個社會負有責任，自己必須站出來，以鼓勵其他人共同行動來改變社會。在MeToo群體述行中，共同的關注、虛擬的在場感構成一個回饋的情感連帶過程，當連帶因素被有效綜合，行動者之間就產生集體意識，團結、道德感和目標願景生發蒂利所說的政治行動WUNC模式的雛形。

公眾連結：透明性敘事與同情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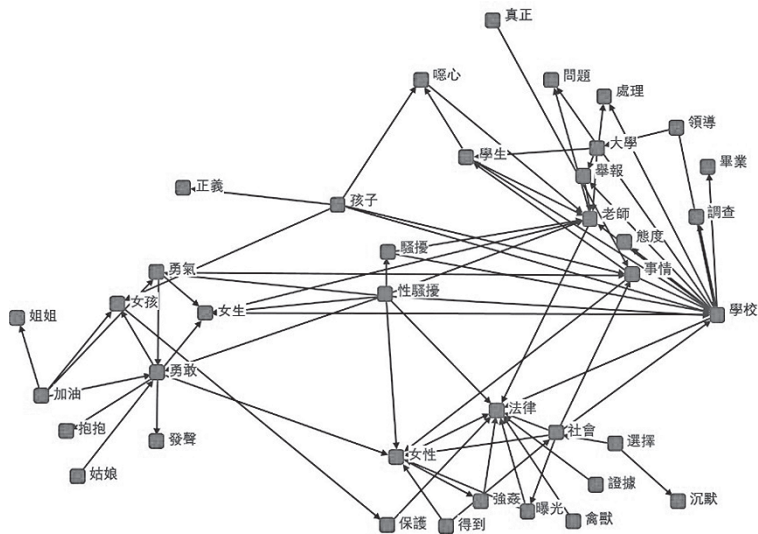
訴諸網絡的舉報是一種適用於數位情境並包含多重策略的敘事傳播，其重點是借助網絡輿論的力量督促（倒逼）公權力展開調查以及獲得公眾理解、同情和支持。數字時代的女性主義運動需要適應數字敘事傳播跨界移動及流變能力越來越強的特點，面對文化壟斷與碎片化敘事同存互參的挑戰（蔡琰、臧國仁，2017），提升向社會公眾宣示自身處境並公共化自身問題的能力。對於反性騷擾行動者來說，其要務是通過透明性敘事獲得公眾信任，以「零度控制與鏡像場景」的敘事方式和自證的透明性原則，服務於互聯網公眾的資訊獲取和判斷過程（陸佳怡、仇筠茜、高紅梅，2019）。西方MeToo行動者通過Twitter向公眾披露創傷經歷時常優先顧及「誰」（who）、「什麼」（what）、「在哪裡」（where）、「何時」（when）、「為什麼」（why）和「如何」（how）這幾個敘事要素，提高了人們對性暴力事實的普遍認知（Bogen, Bleiweiss, Leach, & Orchowski, 2019）。本研究發現，中國MeToo運動的舉報者亦同樣採取這種透明性敘事策略，建構公民新聞導向的敘事文本，不僅披露當事人雙方的姓名、職業、個人經歷等身份性、背景性資訊，還對事發的過程性資訊、細節進行描述性回憶，對自身的創傷心路歷程和人生困境展開剖白。比如ZX事件的舉報者向公眾拿出自己抑鬱症的測試結果，LC事件的當事人公開承認自己在看心理醫生等等。對網絡舉報來說，事實細節越是充分，公眾的了解和判斷就越是清晰；受害者越是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7期(2021)

不惜代價曝光對方和剖白自己的痛苦，公眾的同情和信任就越是充分，由此獲得「同情賦權」(empowerment through empathy)也就越多。在經典社會運動理論中，此種抗爭策略被歸納為「損害邏輯」(the logic of damage)和「見證邏輯」(the logic of bearing witness)，其特點是在足夠大的範圍內營造出足夠強烈的悲情，並將這種悲情轉換為輿論壓力(馮仕政，2013：184-185；楊國斌，2009)。

MeToo運動是一種基於同情的政治實踐，同情既是社會的情感交流機制，也是人類「理解的心靈」和「擴展的精神」產生的感性基礎(袁光鋒，2019)，是一種共同體整合的政治實踐。為了了解國內公眾對MeToo運動的具體反應，本研究對部分網絡舉報信的公眾評論內容展開分析，共搜集了10封舉報信下所列的前100條熱門評論，總計約1,000條評論，通過軟體統計得到語義網絡分析圖，如圖二：

圖二 公眾評論語義網絡圖



通過圖二可以看到，公眾圍繞性騷擾舉報事件展開了諸多節點的討論，其中三個中心性節點是「勇敢」、「學校」和「法律」，體現公眾認知框架的三個層面。首先，公眾對站出來進行舉報的人表達同情和支持，稱讚她們「勇敢」並給予鼓勵，「加油」是評論中最經常出現的話。同時，公眾常用「禽獸」、「噁心」等高情緒度詞彙表達憤慨。特別是施

「述行性連結」與數字女性主義行動

害者利用權勢打壓受害者的情節最容易引發公眾對社會不公正經驗的感知。一些冠以「長江學者」、「公益英雄」身份的人也捲入性騷擾事件，更讓人感到諷刺和幻滅，強化人們針對制度的怨恨情緒。

在機構與組織層面，公眾普遍重視被舉報者所在單位的態度，學校、教育系統以及師生權力關係成為討論的熱點。在制度和文化層面，公眾對法律和社會在女性保護方面很不滿意，認為法律對施害者的懲處力度不夠，導致性騷擾犯罪成本低。「一個長期視女性為資源的環境，一個不尊重女性自主意願和身體邊界的環境，是一個權力太過輕易被濫用而不用付出代價的環境，是一個歸罪受害者更為普遍的環境」（孫金昱，2018）。在類似的討論中，「性騷擾不關乎性，而是關乎權力」的觀點受到一定認同，「強者—弱者」的結構性對峙浮現為公眾論述的主導框架。

制度連結：由情入理與「引西入中」

女性主義行動在相當程度上是基於情感的政治，「情感是共意的基礎，佔居共意動員的核心地位」（楊國斌，2009）。但是僅基於情感的動員不足以構成社會運動完整的意義和價值目標。如果沒有理性參與，運動過程往往產生結構性偏離，甚至走向自身的反面。MeToo運動因而需要有意識地克服「情感正當性與情感宣洩後果」之間的悖論，避免走向「反目的性」行動和博弈論困境。因此MeToo運動的述行者不僅需要以移情建立宣示自己的能力，更需要問題化自身處境並使之理性化、公共化的能力，力求與制度進行有效對話。本研究顯示，舉報者與制度之間存在著明顯的話語指涉關係，構成MeToo述行的主要的關係類型。舉報者通過對被性騷擾經歷和舉報經歷的反思，要求國家在制度、法律法規層面上予以回應，在「舉報訴求」、「舉報困境」、「理性批判」三個基本範疇中，常論及建立性騷擾防禦和懲處機制。羅茜茜第一案中就公開提出「督促建立並出台有效的校園性騷擾防範機制」的理性要求。

MeToo運動的制度性述行包含著三個方面的連結基礎：基於知識普及的新型主體生成，基於中西連結的制度參照，以及基於社會力量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7期(2021)

介入的框架「轉譯」。首先，MeToo運動的舉報者多為擁有較高文化資本的女性，她們覺知性騷擾問題的結構性困境的能力更強，甚至具備「對父權制在社會中的具體運作方式的深入了解，以及掌握通過『引用』他人的經驗獲得自我賦權的方法」(常江，2018)，從而有意識地在制度層面上訴諸行動。其次，MeToo運動的制度性推進很大程度上是中西連結和制度資源「引西入中」的結果。運動發起人羅茜茜在美國學習期間，看到了美國高等教育機構普遍制定和實施了反性騷擾法規，但中國還沒有這樣的制度。自身經歷和認知上的對比促使她決定點燃中國MeToo運動的導火線。在整個運動期間，海外留學生或校友網絡是一支重要的連結性力量(Denyer & Wang, 2018; Zeng, 2020)，他們與國內的志願者一起，以發達國家/地區的高校或境外企業的防性騷擾制度為依據，集思廣益地搜集經驗、標準，制定手冊，向機構與法律部門提出建議或決策方案，對MeToo運動進行制度性「轉譯」，並發起宣導活動等。

「述行性連結」的數字擴展實踐

「述行性連結」強調行動者的言語行為是徵引性的意指鏈運作，構成縱橫交錯的述行網絡和動態的互文空間。而數字傳播技術促使這一述行網絡被置於一個更廣泛的「媒介化」(mediation)情境中展開，因而理解「述行性連結」必須在語言維度之外納入傳播技術的維度。庫爾德利(Couldry, 2008)指出，「媒介化」的重要性是帶來一種新的交流情境(context)的出現，擴展已有的社會實踐方式，使個體有了更多參與公共活動的可能性。本文秉持技術的社會建構觀點，認為新傳播技術給女性主義運動帶來了一種組織可能性，但新技術不是孤立而抽象地發揮作用，它是被徵用於主體的語言連續體，並嵌入到女性主體的述行過程之中，使其述行網絡得以更自由地架構和擴展，從而為行動者引入一種更高層次的交互能力，甚至，如馬諾維奇所述，新媒介技術本身就是一種「語言」(馬諾維奇，2020)。在本文案例中，這種「語言」交互主要體現為三種數字文本間技術的運用，使得MeToo運動的述行實踐迭代為「超文本」(hypertext)述行實踐。

標籤：述行空間的連接和擴展

標籤 (hashtag) 是數字傳播時代一種新的讀寫方式，以共同認知的概念概括事物，以便於人們快速對事物作判斷。標籤是一種關係性、檢索性的文本組織方式，是更為主動的分類交流，即分享的過程。可標籤化意味著內容能夠通過共用實現多級傳播，使不同的可能世界和意義視域聚焦，釋放更多潛能 (許煜，2018：203–204)。標籤以及所創造的連結模式因而成為數字社會的「元資訊」(meta-information)，衍生出多樣態的虛擬聚集。MeToo 運動發端於對 #MeToo 標籤的挪用，標籤所攜帶的信息在社交媒體實現「病毒式」分享和迅猛傳播：艾莉莎·米蘭諾在推特上發出號召的當天，#MeToo 標籤在推特 (Twitter) 上就被使用了 20 多萬次，一天後超過了 50 萬次。在臉書 (Facebook) 上，最初 24 小時內，470 多萬人在 1,200 萬個帖子中使用了這個標籤 (Bogen, Bleiweiss, Leach, & Orchowski, 2019; CBS, 2017; Sayej, 2017)。中國 MeToo 運動沿用這個既有標籤，又發展出各種變體，比如「#metoo」、「#我也是」等，更擴展了連結能力。通過標籤的使用，單個文本生發為流動的文本空間，集納各方主體在此文本空間中相遇、傾訴、論辯，創造「數字化故事共用」(digital story telling) 的虛擬空間。「倖存者」因而連結了身體、經驗與情感的記憶，生成可見性並邀請社會參與，最終促進賦權的產生。

模因與數字偽飾：彈性述行策略

模因 (meme) 是一種具有象徵意義的「包裹」(packet)，易於傳播與模仿，又可以根據個人的需求進行調適，廣泛地與他人共用。人們通過分享來模仿這些文化因數，使用個性化的表達加以「移用」(appropriation) 後進行傳播 (班尼特、塞格伯格，2013)。在中國 MeToo 運動中，模因傳播既體現為不同行動主體組建多元的主題行動 (比如「#I will be your voice#」微博發聲行動)；也體現為不同境遇的女性利用有利空間或時機訴說自己的遭遇；更體現為在網絡審查的條件下線民的創新表演和「數字偽飾」(digital masquerading) (Tan, 2017)。為應對遮罩標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7期(2021)

籤、過濾關鍵字等網絡限制，線民創制出各種新的符碼表徵形式，進行「貓鼠遊戲」。比如將「MeToo」改拼為「MiTu」，或者直接用漢語「米兔」代替；或進一步以圖代文：一碗米飯和一隻兔子成對圖釋，意指「MeToo」；或者旋轉圖像，規避自動化的數碼識別。除此以外，一些外來語和方言也被用來進行模因傳播，例如，由「我也是」(MeToo)演變出「老子也是」、「俺也是」等等。在MeToo運動波及佛教界以後，線民挪用「阿彌陀佛」佛號，將「MiTu」模因嵌入其中，組配成「amitufo」，從而製造一種微妙的反諷(Zeng, 2019)。不過，在集體行動受到嚴格監控的條件下(Fu, 2017; King, Pan, & Roberts, 2013)，網絡模因行動越來越難以成功，因為標籤和模因既可以是一種組織方式，也能被智能機器輕易捕捉，被迅速識別和自動化打擊(Lim, 2018; Zeng, 2019)。模因與「數字偽飾」因而變成一個不斷升級的動態競爭場域，開辟協商的、彈性調整的語義塗層(semantic coating)空間，建構中國式述行網絡的特色。

檔案與時間線重組

檔案即存儲媒介，傳統上是官方性的規範文本，並帶有戒律和權威意味。它記錄和複製集體記憶，並呈現關於當代社會和文化生活的變遷基礎。在Web2.0技術出現以後，傳統檔案的深層形態已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它正變得「產銷合一」並日益個體化(蓋恩、比爾，2015：67-68)。錄音錄影、拍攝、截圖、截屏等隨時生成的「數碼物」即刻成為檔案，又即刻被運用於現實。甚至每時每刻的數字化書寫的過程也具備「銘刻」現實的潛質，成為檔案生產的環節。新媒介技術已發展出資訊存儲和建檔的新結構與能力，介入時間連續性和時序意義上的象徵性聚集，因而從歷史的地層中躍出，成為重組時間線的一股力量(蓋恩、比爾，2015：11)。中國MeToo運動的行動者不僅有效徵引20年前的北大高岩案和《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作者林奕含自殺個案作為歷史「檔案」來召回已逝的時間，還運用數字化檔案技術組建和呈現了大量「證據性資訊」。正是這些「檔案」，成為向現實發問的雄辯的力量。及至2019年上海的錢逢勝案，受害者女性已經開始有意識地即刻運用數

字檔案技術(現場開啟手機錄音、微信聊天記錄截圖等)進行時間的捕獲,組織起確鑿的證據鏈條,達成透明性敘事,從而展開迅即的(而不是多年後回溯的)反性騷擾行動並取得成功。在這些案例中,檔案作為一種來回穿梭的時間媒介,以其靈活的非線性跳躍的方式,被綜合進MeToo運動的故事網絡和述行實踐,參與現實抗爭與社會邊界的重構。

結論與討論

中國MeToo運動是一場女性主義述行運動。通過網絡舉報、故事敘事和言語互動實踐,女性行動者一方面發掘、培育自身的主體性,尋求團結與認同;一方面踐行社會責任,堅持社會對話並表達重構社會邊界的行動訴求。因此MeToo運動不單是AC公民式的個體主義行動,而是具有公共性意義的集體行動實踐,是數字化時代女性主義運動的新形式。中國MeToo運動在輿論空間掀起關於兩性社會邊界和性別權力的激烈討論和反思,其運動成果不僅體現在防性騷擾機制在局部範圍的嘗試建立,更體現在國家法律法規的相繼調整中:2018年底最高人民法院首次把「性騷擾損害責任糾紛」增列為民事案件案由;2020年《民法典》通過立法,將反性騷擾規定在人格權編第二章:生命權、身體權和健康權項下,並完善了數字時代性騷擾認定的有關規定。

本文表明,述行本身就是一種連結性實踐,它借助語言(以及言語所包含的情感、意義和關係)的生產和流動,在行動者自我、群體、公眾與制度等多個層次上展開連結,包含著豐富的權力關係意涵。社會運動的「連結性」根植於人的語言網絡和行為關聯性,根植於不平等的權力結構網以及為權利而鬥爭這一社會內驅力量。新傳播技術提供了激發和組織運動的一個新條件,卻未必提供了充分的條件和動因,運動發生的根本動因需要深入到群體的結構位置和權力關係之中去尋找,並且關聯其歷史脈絡和特定情境中的行動智慧。

本文以中國MeToo運動為經驗對象,著重挖掘女性MeToo敘事中所包含的情感、意義和關係連結性,以及這一連結實踐如何在「新媒介語言」的運用中得以擴展,從而提出「述行性連結」的概念。這一概念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7期(2021)

將意義與關係連結性視為社會運動的內在動因，將數位傳播技術視為擴展意義和關係連結的文化技術，因而它涵蓋了兩個維度：其一是語言主體間的能動性連結；其二是新傳播媒介的技術性連結，即數碼物對人的關聯聚集及其衍生的建構作用。二者之間相互迭加，緊密交織，形成一個語義與技術交融、相互適應的「締合」(associated)的連結性概念構型。只有在這種「締合性」邏輯上建立對「連結性」的完整理解，才能解釋在個體化政治崛起的條件下，數字社會運動仍然貫穿著集體意識、責任感和情感歸屬的生成，因而在邏輯上仍然自洽於蒂利所總結的經典政治行動模式。

在對社會運動轉型問題的洞察上，「述行性連結」概念提示數字社會運動與經典社會運動具有相通的一面，仍然承續了集體行動某些根本性的連結經驗，因而「述行性連結」所提供的是一種對新傳播技術和人類政治行動關係的更審慎的理解。數字傳播技術給人類實踐帶來交流情境的擴展和更廣泛的意義視域，並促使社會參與結構的轉化、文化交互界面(cultural interface)的更新以及行動者問題化能力的提高。但如斯蒂夫·詹森所說，由交互界面操作的連結關係始終是文化的和語義學層面的，它體現為意義和表達而非物理力量(Johnson, 1997, p. 14)。迄今可見，新傳播技術所導致的連結時代的到來不是取消了人們的述行活動，而是激發了行動者的述行熱情，創造出更多的述行可能性和方式方法，甚而整個社會趨於被連結成為一張「述行之網」。其原因在於，語義網與社會結構之間存在一種聯動的循環關係，共同導引著連結和社會交流。換言之，人類進入數字化空間後不應以語言的述行性斷裂為代價而走向客體化，而應看到主體配置和運用新媒介語言的潛能，以展開跨界域的和更靈動的連結性文化策略。

任何類型的社會運動，不過是「一個行動、實踐或思想領域的發展如何向政治發問」(福柯、拉比諾，2020)。「連結性行動」和「述行性連結」概念共同闡明的是數字時代的公眾由於網絡傳播技術的「內置」帶來自組織能力的提升，但「述行性連結」強調數字時代的行動者需要加強對自身處境的闡述能力和「能動綜合」能力，以獲得新的問題化技術，而不是幻想通過技術的自動化運作實現目標。如社會學家圖海納

「述行性連結」與數字女性主義行動

(2008: 5) 所號召的，行動者要對社會文化參與模式的更新保持足夠敏感，以一種「歸來」的主體姿態和行動能力創造出新的「歷史質」。

本文是一項以實名舉報行動為對象的探討，其局限在於未能涵蓋 MeToo 運動多樣化的行動實踐，比如匿名舉報、中介行動者（女性主義支持者、志願者等）的介入和參與等。這些經驗如何補充或擴展「述行性連結」概念範疇？中介行動者的角色確如「連結性行動」所暗示的那樣將被技術取代而退出數字社運舞台嗎？中國以外的社會情境中的 MeToo 行動者又如何展開其述行實踐？這些問題值得後續研究進一步探討。

註釋

- 1 「Performativity」一詞的翻譯存在分歧，中文多譯作「操演」、「展演」、「表演」等，裘蒂斯·巴特勒著作《身體之重：論「性別」的話語界限》的譯者李均鵬認為應譯作「述行」，意為「以言施事」。巴特勒的理論基礎之一建立在哲學語言學家 J·L·奧斯丁的語言「施事」(performative) 行為思想之上，因此將「performativity」譯作「述行」更符合巴特勒原意。國內也有譯為「敘行」的情況。不過「述行」在語用上還不夠曉暢，故本文視上下文語境也偶爾等同使用「操演」或「展演」。
- 2 主要觀察對象有「NGO MeToo」、「#還有我」、「MeToo 在中國」、「Matters Lab」、「人間 the livings」、「#I will be your voice#」等網站、論壇和微博平台等；還包括活躍的微博帳戶「清華常江」、「李思磐」、「果子狸 777」、「新媒體女性」、「反吃瓜聯盟」等，微信公眾號則主要關注「女泉」、「廣州性別中心」、「西柚記」、「橙雨傘」、「NGOCN 君」等個人或社團號。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王思斌 (編) (1999)。《社會工作概論》。北京：高教出版社。

Wang Sibin (Ed.) (1999). *Shehui gongzuo gailun*. Beijing: Gaojiao chubanshe.

中國米兔志編輯組 (2019年8月25日)。〈中國米兔志 (2018.1–2019.7)〉。取自文件資料索引庫，<https://cnlgbtdata.com/doc/166/>。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7期(2021)

- Zhongguo mitu zhi bianjizu (2019, August 25). Zhongguo mitu zhi (2018.1–2019.7). *Wenjian ziliao suoyinku*. Retrieved August 25, 2019, from <https://cnlgbtdata.com/doc/166/>.
- 尼古拉斯·蓋恩·大衛·比爾(2015)。《新媒介：關鍵概念》(劉君、周競男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原書Gane, N. & Beer, D. [2008]. *New media: The key concept*. Oxford, England: Berg.)
- Nigulasi Gaie, Dawei Bier (2015). *Xinmeijie: Guanjian gainian* (Liu Jun, Zhou Jingnan, Trans.). Shanghai: Fudan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Gane, N., & Beer, D. [2008]. *New media: The key concept*. Oxford, England: Berg.)
- 皮埃爾·布爾迪厄(2017)。《男性統治》(劉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原書Bourdieu, P. [1998]. *La domination masculine*. Paris: Seuil.)
- Piaier Buerdie (2017). *Nanxing tongzhi* (Liu Hui, Trans.). Beijing: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Bourdieu, P. [1998]. *La domination masculine*. Paris: Seuil.)
- 艾曉明(2018年7月29日)。〈倖存者的屈辱書寫〉。取自豆瓣網，<https://www.douban.com/note/684700069/?from=author>。
- Ai Xiaoming (2018, July 29). Xingcunzhe de quru shuxie. *Doubanwang*. Retrieved July 29, 2018, from <https://www.douban.com/note/684700069/?from=author>.
- 朱麗亞·克里斯蒂娃(2016)。《主體·互文·精神分析：克里斯蒂娃復旦大學演講集》(祝克懿、黃蓓譯)。北京：三聯書店。
- Zhuliya Kelisidiwa (2016). *Zhuti huwen jingshenfenxi: Kelisidiwa Fudan daxue yanjiangji* (Zhu Keyi, Huang Bei, Trans.). Beijing: Sanlian shudian.
- 米歇爾·福柯(2016)。《自我技術：福柯文選：III》(汪民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原書Foucault, M. [1988].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Martin, L. H., Gutman, H., & Hutton, P. H. (Eds).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 Mixieer Fuke (2016). *Ziwo jishu: Fuke wenxuan: III* (Wang Minan, Trans.).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Foucault, M. [1988].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Martin, L. H., Gutman, H., & Hutton, P. H. (Eds.).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 米歇爾·福柯、拉比諾(2020)。〈論戰，政治與問題化：一次與福柯的訪談〉(唐繼堯譯)。取自 <https://mp.weixin.qq.com/s/9eWLFkhzzkYsMohf4u4DDg>。(原文Foucault, M. [1984]. *Polemics, politics, problematization*. In P. Rabinow [Ed.], *The Foucault reader* [pp. 381–390].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Mixieer Fuke, Labinuo (2020). Lunzhan, zhengzhi yu wentihua: Yici yu Fuke de fangtan (Tang Jiyao, Trans.). Retrieved from <https://mp.weixin.qq.com/>

- s/9eWLFkhzzkYsMohf4u4DDg. (Original paper: Foucault, M. [1984]. Polemics, politics, problematization. In P. Rabinow [Ed.], *The Foucault reader* [pp. 381–390].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列夫·馬諾維奇 (2020)。《新媒體的語言》(車琳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原書 Manovich, L. [2001]. *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Liefu Manuweiqi (2020). *Xinmeiti de yuyan* (Che Lin, Trans.). Guiyang: Guizhou renmi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Manovich, L. [2001]. *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沈奕菲 (2004)。〈「性騷擾」概念的泛化、窄化及應對措施〉。《婦女研究論叢》，第1期，頁11–16。
- Shen Yifei (2004). “Xing saorao” gainian de fanhua, zhaihua ji yingdui cuoshi. *Funü yanjiu luncong*, 1, 11–16.
- 何成洲 (2014)。〈巴特勒與操演性理論〉。伊莉莎白·韋德、何成洲(主編)，《當代美國女性主義經典理論選讀》(頁18–31)。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 He Chengzhou (2014). Batele yu caoyanxing lilun. In Yilishabai Weide, He Chengzhou (Eds.), *Dangdai Meiguo nüxing zhuyi jingdian lilun xuandu* (pp.18–31). Nanjing: Nanjing daxue chubanshe.
- 宋建麗 (2018)。《正義與關懷：女性主義的視角》。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Song Jianli (2018). *Zhengyi yu guanhuai: Nüxing zhuyi de shijiao*. Xiamen: Xiamen daxue chubanshe.
- 李永博 (2018年12月20日)。〈#MeToo一周年：女性的處境變好了嗎？〉。《新京報書評週刊》，取自 <https://www.bjnews.com.cn/detail/154536007514910.html>。
- Li Yongbo (2018, December 20). #MeToo yi zhounian: Nüxing de chujing bianhao le ma? *Xinjingbao shuping zhoukan*. Retrieved December 20, 2018, from <https://www.bjnews.com.cn/detail/154536007514910.html>.
- 李思磐 (2020年6月19日)。〈微博女權：「政治正確」抑或「商業正確」？〉。《澎湃思想市場》。取自 <https://mp.weixin.qq.com/s/dgQ4I5heI3fwG-xoAshASQ##>。
- Li Sipan (2020, June 19). Weibo nüquan: “Zhengzhi zhengque” yihuo “shangye zhengque”? *Pengpai sixiang shichang*. Retrieved June 19, 2020, from <https://mp.weixin.qq.com/s/dgQ4I5heI3fwG-xoAshASQ##>.
- 阿克塞爾·霍耐特 (2005)。《為承認而鬥爭》(胡繼華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書 Honneth, A. [1992]. *Kampf um Anerkennung: Zur moralischen Grammatiksozialer Konflikte*. Frankfurt/M.: Suhrkamp.)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7期(2021)

- Akesaier Huonaite (2005). *Wei chengren er douzheng* (Hu Jihua,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Honneth, A. [1992]. *Kampf um Anerkennung: Zur moralischen Grammatiksozialer Konflikte*. Frankfurt/M.: Suhrkamp.)
- 阿蘭·圖海納(2008)。《行動者歸來》(舒詩偉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原書 Touraine, A. [1984]. *Le retour de l'acteur: Essai de sociologie*. Paris: Fayard.)
- Alan Tuhaina (2008). *Xingdongzhe guilai* (Shu Shiwei et al., Trans.).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Original book: Touraine, A. [1984]. *Le retour de l'acteur: Essai de sociologie*. Paris: Fayard.)
- 武秀琴(2013年8月26日)。〈性騷擾可致長期心理創傷，遭遇騷擾切勿沉默以對〉。《中國婦女報》，第B02版。
- Wu Xiuqin (2013, August 26). Xing saorao ke zhi changqi xinli chuangshang, zaoyu saorao qiexu chenmo yidui. *Zhongguo funü bao*, p. B02.
- 約翰·彼得斯(2003)。《交流的無奈》(何道寬譯)。北京：華夏出版社。(原書 Peters, J. D. [1999]. *Speaking into the air: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Yuehan Bidesi (2003). *Jiaoliu de wunai* (He Daokuan, Trans.). Beijing: Huaxia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Peters, J. D. [1999]. *Speaking into the air: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查爾斯·蒂利(2012)。《政權與鬥爭劇碼》(胡位均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書 Tilly, C. [2006]. *Regime and repertoire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haersi Dili (2012). *Zhengquan yu douzheng juma* (Hu Weijun,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Tilly, C. [2006]. *Regime and repertoire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孫金昱(2018年7月28日)。〈泛泛指責#MeToo是多數人的暴政，辜負了高高舉起的正義之旗〉。取自端傳媒，<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0728-opinion-sunjinyu-metoo/>。
- Sun Jinyu (2018, July 28). Fanfan zhize #MeToo shi duoshuren de baozheng, gufu le gaogao juqi de zhengyi zhi qi. *Duan chuanmei*. Retrieved July 28, 2018, from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0728-opinion-sunjinyu-metoo/>.
- 徐小棠(2018)。〈從反叛到和解——21世紀初日本家庭片的創傷敘事研究〉。《當代電影》，第11期，頁111-116。
- Xu Xiaotang (2018). Cong fanpan dao hejie—21 shiji chu Riben jiating pian de chuangshang xushi yanjiu. *Dangdai dianying*, 11, 111-116.

「述行性連結」與數字女性主義行動

- 袁光鋒 (2019)。〈作為政治實踐的「同情」：同情、審議民主與社會結構〉。《學海》，第1期，頁83–89。
- Yuan Guangfeng (2019). Zuwei zhengzhi shijian de “tongqing”: Tongqing, shenmi minzhu yu shehui jiegou. *Xuehai*, 1, 83–89.
- 陸佳怡、仇筠茜、高紅梅 (2019)。〈零度控制與鏡像場景：公民新聞的透明性敘事〉。《國際新聞界》，第5期，頁39–59。
- Lu Jiayi, Qiu Yunqian, Gao Hongmei (2019). Lingdu kongzhi yu jingxiang changjing: Gongmin xinwen de touming xing xushi. *Guoji xinwenjie*, 5, 39–59.
- 常江 (2018)。〈米兔運動、介入式文化研究與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全球傳媒學刊》對話常江副教授〉。《全球傳媒學刊》，第3期，頁73–82。
- Chang Jiang (2018). Mitu yundong, jierushi wenhua yanjiu yu zhishi fenzi de shehui zeren—*Quanqiu chuanmei xuekan* duihua Chang Jiang fu jiaoshou. *Quanqiu chuanmei xuekan*, 3, 73–82.
- 曼紐爾·卡斯特 (2018)。《傳播力》(湯景泰、星辰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原書 Castells, M. [2009]. *Communication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nnier Kasite (2018). *Chuanbo li* (Tang Jingtai, Xing Chen, Trans.).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Castells, M. [2009]. *Communication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許煜 (2018)。《論數碼物的存在》(李婉楠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書 Hui, Y. [2016]. *On the existence of digital objects*.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Xu Yu (2018). *Lun shumawu de cunzai* (Li Wannan,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Hui, Y. [2016]. *On the existence of digital objects*.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湯尼·白露 (2011)。《中國女性主義思想史中的婦女問題》(沈齊齊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書 Barlow, T. E. [2004]. *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
- Tangni Bailu (2011). *Zhongguo nüxing zhuyi sixiangshi zhong de funü wenti* (Shen Qiqi,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Barlow, T. E. [2004]. *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
- 馮仕政 (2013)。《西方社會運動理論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Feng Shizheng (2013). *Xifang shehui yundong lilun yanjiu*. Beijing: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7期(2021)

- 楊國斌(2009)。〈悲情與戲謔：網絡事件中的情感動員〉。《傳播與社會學刊》，第9期，頁39-66。
- Yang Guobin (2009). *Beiqing yu xixue: Wangluo shijian zhong de qinggan dongyuan. Chuanbo yu shehui xuekan*, 9, 39-66.
- 楊國斌(2017)。〈情之殤：網絡情感動員的文明進程〉。《傳播與社會學刊》，第40期，頁75-104。
- Yang Guobin (2017). *Qing zhi shang: Wangluo qinggan dongyuan de wenming jincheng. Chuanbo yu shehui xuekan*, 40, 75-104.
- 楊宙(2018年8月22日)。〈舉報性騷擾之後〉。《人物》，取自 <https://terminus2049.github.io/archive/2018/08/22/xianzi-jubao-xingsaorao.html>。
- Yang Zhou (2018, August 22). *Jubao xing saorao zhi hou. Renwu*. Retrieved August 22, 2018, from <https://terminus2049.github.io/archive/2018/08/22/xianzi-jubao-xingsaorao.html>.
- 裘蒂斯·巴特勒(2011)。《身體之重：論「性別」的話語界限》(李均鵬譯)。上海：三聯書店。(原書Butler, J. [1993].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London: Routledge.)
- Qiudisi Batele (2011). *Shenti zhi zhong: Lun "xingbie" de huayu jixian* (Li Junpeng, Trans.).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 (Original book: Butler, J. [1993].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London: Routledge.)
- 裘蒂斯·巴特勒(2014)。〈身不由己：關於性自主權的界限〉(王華譯)。伊莉莎白·韋德、何成洲(主編)，《當代美國女性主義經典理論選讀》(頁25-43)。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原文選自Butler, J. [2004]. *Undoing gender*.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 Qiudisi Batele (2014). *Shenbu youji: Guanyu xing zizhuquan de jixian* (Wang Hua, Trans.). In Yilishabai Weide, He Chengzhou (Eds.), *Dangdai Meiguo nüxing zhuyi jingdian lilun xuandu* (pp. 25-43). Nanjing: Nanjing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Butler, J. [2004]. *Undoing gender*.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 蔡琰、臧國仁(2017)。〈數位時代的「敘事傳播」：兼論新科技對傳播學術思潮的可能影響〉。《新聞學研究》，第131期，頁1-48。
- Cai Yan, Zang Guoren (2017). *Shuwei shidai de "xushi chuanbo": Jianlun xin keji dui chuanbo xueshu sichao de keneng yingxiang. Xinwenxue yanjiu*, 131, 1-48.
- 熊易寒(2007)。〈「問題化」的背後——對當前中國社會衝突的反思〉。《社會學家茶座》，第2期，頁25-28。

「述行性連結」與數字女性主義行動

- Xiong Yihan (2007). “Wentihua” de beihou—Dui dangqian Zhongguo shehui chongtu de fansi. *Shehuixue jia chazuo*, 2, 25–28.
- 潘綏銘、黃盈盈 (2007)。〈「主體建構」：性社會學研究視角的革命及本土發展空間〉。《社會學研究》，第3期，頁174–193。
- Pan Suiming, Huang Yingying (2007). “Zhuti jiangou”: Xing shehuixue yanjiu shijiao de geming ji bentu fazhan kongjian. *Shehuixue yanjiu*, 3, 174–193.
- 劉小楠 (2014)。〈性騷擾的現狀及法律規制——以港台地區性騷擾立法為鑒〉。《婦女研究論叢》，第4期，頁41–48。
- Liu Xiaonan (2014). Xing saorao de xianzhuang ji falü guizhi—Yi Gang Tai diqu xing saorao lifa weijian. *Funü yanjiu luncong*, 4, 41–48.
- 蘭斯·班尼特、亞歷山卓·塞格柏格 (2013)。〈「連結性行動」的邏輯：數字媒體和個人化的抗爭性政治〉 (史安斌、楊雲康譯)。《傳播與社會學刊》，第26期，頁211–245。
- Lansi Bannite, Yalishanzhuo Saigebo (2013). “Lianjiexing xingdong” de luoji: Shuzi meiti he gerenhua de kangzhengxing zhengzhi (Shi Anbin, Yang Yunkang, Trans.). *Chuanbo yu shehui xuekan*, 26, 211–245.
- 酈菁 (2018a)。〈MeToo之後：反性騷擾政策在中國的未來〉。《文化縱橫》，第5期，頁134–141。
- Li Jing (2018a). MeToo zhi hou: Fan xing saorao zhengce zai Zhongguo de weilai. *Wenhua zongheng*, 5, 134–141.
- 酈菁 (2018b)。〈比較視野中的反性騷擾政策——話語建構、政策過程與中國政策制定〉。《婦女研究論叢》，第3期，頁33–45。
- Li Jing (2018b). Bijiao shiye zhong de fan xing saorao zhengce—Huayu jiangou, zhengce guocheng yu Zhongguo zhengce zhiding. *Funü yanjiu luncong*, 3, 33–45.
- 讓·愛爾斯坦 (2019)。《公共的男人，私人的女人：社會與政治思想中的女性》 (葛耘娜、陳雪飛譯)。北京：三聯書店。(原書Elshtain, J. B. [1981]. *Public man, private woma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ang Aiersitan (2019). *Gonggong de nanren, siren de nüren: Shehui yu zhengzhi sixiang zhong de nüxing* (Ge Yunna, Chen Xuefei, Trans.). Beijing: Sanlian shudian. (Original book: Elshtain, J. B. [1981]. *Public man, private woma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 Bennett, L. (2008). Changing citizenship in the digital age. In L. Bennett (Ed.), *Civic life online: Learning how digital media can engage youth* (pp. 1–24).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Bennett, L., & Segerberg, A. (2012). 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 Digital media and the personalization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5*(5), 739–768.
- Bennett, L., Wells, C., & Rank, A. (2009). Young citizens and civic learning: Two paradigms of citizenship in the digital age. *Citizenship Studies, 13*(2), 105–120.
- Berridge, S., & Portwood-Stacer, L. (2015). Introduction: Feminism, hashtags a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Feminist Media Studies, 15*(2), 341–344.
- Bogen, K. W., Bleiweiss, K. K., Leach, N. R., & Orchowski, L. M. (2019). #MeToo: Disclosure and response to sexual victimization on Twitter.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00*(0), 1–32.
- Bondes, M., & Schucher, G. (2014). Derailed emotions: The transformation of claims and targets during the Wenzhou online incident.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7*(1), 45–65.
- Burke, T. (2017, October 23). “Empowerment through empathy”—We spoke to Tarana Burke, the woman who really started the “Me Too” movement. *Elle Magazin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elle.com/uk/life-and-culture/culture/news/a39429/empowerment-through-empathy-tarana-burke-me-too/>.
- CBS (2017). *More than 12M “MeToo” Facebook posts, comments, reactions in 24 hours*. Retrieved December 10, 2017, from <https://www.cbsnews.com/news/metoo-more-than-12-million-facebook-posts-comments-reactions-24-hours/>.
- Chadwick, A. (2017). *The hybrid media system: Politics and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uldry, N. (2008). Mediatization or mediation? Alternative understandings of the emergent pace of digital storytelling. *New Media & Society, 10*(3), 373–391.
- Denyer, S., & Wang, A. Z. (2018, January 9). Chinese women reveal sexual harassment, but #MeToo movement struggles for air. *The Washington Post*. Retrieved from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chinese-women-reveal-sexual-harassment-but-metoo-movement-struggles-for-air/2018/01/08/ac591c26-cc0d-4d5a-b2ca-d14a7f763fe0_story.html.
- Dixon, K. (2014). Feminist online identity: Analyzing the presence of hashtag feminism. *Journal of Arts and Humanities, 3*(7), 34.
- Freeman, J. (1972). The tyranny of structurelessness.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17*, 151–164.
- Fu, D. (2017). Disguised collective action in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50*(4), 499–527.

- Horeck, T. (2014). #AskThicke: “Blurred lines,” rape culture, and the feminist hashtag takeover. *Feminist Media Studies*, 14(6), 1105–1107.
- Johnson, S. (1997). *Interface culture: How new technology transforms the way we create and communicate*. New York: Basic Books.
- Karpf, D. (2014). Comment on “Organization in the crowd: Peer production in large-scale networked protest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7(2), 261–263.
- Kavada, A. (2015). Creating the collective: Social media, the occupy movement and its constitution as a collective actor.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8(8), 872–886.
- King, G., Pan, J., & Roberts, M. E. (2013). How censorship in China allows government criticism but silences collective express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7(2), 326–343.
- Li, J., & Li, X. (2017). Media as a core political resource: The young feminist movements in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0(1), 54–71.
- Lim, L. (2018, March 2). China’s #MeToo censorship bypassed through netizens’ creative use of languag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Retrieved from <https://www.scmp.com/magazines/post-magazine/shortreads/article/2134847/chinas-metoo-censorship-bypassed-through>.
- Lim, M. (2013). Framing Bouazizi: “White Lies”, hybrid network, and collective/connective action in the 2010–11 Tunisian uprising. *Journalism: Theory, Practice & Criticism*, 14(7), 921–941.
- Mendes, K., Ringrose, J., & Keller, J. (2018). #MeToo and the promise and pitfalls of challenging rape culture through digital feminist activism. *Europe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25(2), 236–246.
- Olsson, T. (2016). Social media and new forms for civic participation. *New Media & Society*, 18(10), 2242–2248.
- Papacharissi, Z. (2016). Affective publics and structures of storytelling: Sentiment, events and mediality.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9(3), 307–324.
- Peters, J. D. (2015). *The marvelous clouds: Toward a philosophy of elemental media*.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ostill, J. (2013). Book review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20(4), 498–507.
- Raphael, J., Rennison, C. M., & Jones, N. (2019). Twenty-five years of research and advocacy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What have we accomplished, and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A conversati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25(16), 2035.
- Sayej, N. (2017, December 1). Alyssa Milano on the #MeToo movement: “We’re not going to stand for it any more.” *The Guardia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guardian.com/culture/2017/dec/01/alyssa-milano-metoo-sexual-harassment-abuse>.

《傳播與社會學刊》· (總) 第 57 期 (2021)

- Suk, J., Abhishek, A., Zhang, Y., Ahn, S. Y., Correa, T., Garlough, C., & Shah, D. V. (2019). #MeToo, networked acknowledgment, and connective action: How “empowerment through empathy” launched a social movement.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XX(X), 1–19.
- Tan, J. (2017). Digital masquerading: Feminist media activism in China. *Crime, Media, Cultur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3(2), 171–186.
- Tilly, C. (2006). WUNC. In J. T. Schnapp, & M. Tiewes (Eds.). *Crowds* (pp. 289–306).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Trott, V. (2017). Connected feminist: Foregrounding the interpersonal in connective action.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3(1), 116–129.
- Wang, Q. (2018). From “non-governmental organizing” to “outer system”—Feminism and feminist resistance in post-2000 China. *NORA-Nordic Journal of Feminist and Gender Research*, 26(4), 260–277.
- Yang, F. (2014). Rethinking China’s Internet censorship: The practice of recoding and the politics of visibility. *New Media & Society*, 18(7), 1364–1381.
- Zarkov, D., & Davis, K. (2018). Ambiguities and dilemmas around #MeToo: #For How Long and #WhereTo? *Europe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25(1), 3–9.
- Zeng, J. (2019). You say #MeToo, I say #MiTu: China’s online campaigns against sexual abuse. In B. Fileborn, & R. Loney-Howes (Eds.), *#MeToo and the politics of social change* (pp. 71–83).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Zeng, J. (2020). #MeToo as connective action: A study of the anti-sexual violence and anti-sexual harassment campaign on Chinese social media in 2018. *Journalism Practice*, 14(2), 171–190.

本文引用格式

黃月琴、黃瑤 (2021)。〈「述行性連結」與數字女性主義行動：基於中國MeToo運動的探討〉。《傳播與社會學刊》，第57期，頁191–224。